

广”<sup>⑩</sup>。

### 三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的兴学、著述、讲学,极大地推动了福建文教事业的发展。

福建地处东南,文教事业开发较迟;但自“延平四贤”出,福建的文教事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延平四贤”都是学识渊博的名儒、著作宏富的文化大师。上文已对杨时、罗从彦、李侗作过简述,这里着重叙述朱熹。朱熹学问极为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著述丰富,无论是哲学、史学、文字,还是教育等,都有创获。朱熹所撰著、编纂、注释、校刊的各类书籍达 64 种之多;此外,他的著述经后人代为编次的也有 61 种<sup>⑪</sup>。经学方面,较突出的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晦庵先生集文公易说》、《四书章句集注》等;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纲目》、《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等;子部书籍有《朱子全书》、《二程语录》、《黄帝阴符经注解》等;集部书籍有《楚辞集注》、《晦庵先生文集》等。“延平四贤”,特别是朱熹,其著述能成一家之言,因此而能在福建广聚生徒,问答辨,弘扬学派,形成重大的学术影响。其门人后学,在他们的启发下,也纷纷著书立说,宏扬传统文化。如:蔡元定著有《易学启蒙》、《洪范解》等,杨复著有《仪礼经传通解续纂祭祀》14 卷,《大学中庸》、《论语问答》、《诗经杂说》等,杨与立著有《朱子语略》,廖德明著有《文公语录》等,刘燠著有《易经说》、《礼记解》、《四书集成》等,林用中著有《东屏集》,林子武著有《尚书术义》10 卷、《中庸章句》、《蒙谷集》等。“延平四贤”还积极兴办学校,聚徒讲学,培养人才。如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时,就“以教养为先”,积极开办县学,所设县学分



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朱熹“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建‘经史阁’,作‘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宾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矩甚严”<sup>⑬</sup>。朱熹还倡立书院,他亲自创办或讲学的有 28 所,在福建境内就有 15 所,其中有名的就有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

杨、罗、李、朱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不倦的海人精神,通过兴学校、建书院,延纳四方门生,成功地开展了一代又一代的私人讲学活动,不仅促进当时福建地方的文化传播,而且对后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和自由讲学风气的提倡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经南宋,历元、明至清,各县普遍设立书院,于官学之外另辟教育阵地,在培养人才、研讨学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罗、李、朱在讲学中,循循善诱,表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杨时谆谆教导罗从彦,既要重视“为学之方”,更要懂得“学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为非正义之士”<sup>⑭</sup>。让罗从彦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罗从彦教育李侗只要在“性地栽培”中开始就谨慎于“是非理欲”,并用心读“诚明静定之书”,注意“用心静处寻求”,就会于“道”上得“融释”,达到孔子、颜渊等圣人的境界;勉励李侗:“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岐。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sup>⑮</sup>李侗对朱熹“只教圣贤言语”<sup>⑯</sup>,终使其完成闽学体系的建构。朱熹在教育弟子方面,也是诲人不倦。黄干说他“讲论经典,高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sup>⑰</sup>朱熹在治学中,主张要先立志,并自觉积极地去学习。“学者要立大志。所谓立志……只是直截要学尧舜。”<sup>⑱</sup>“学问,无贤愚,无大小,无贵贱,自是人合理会的事……人若不自向前,师友如何着得力。”<sup>⑲</sup>“看文字,要耸起精神,树起筋骨”<sup>⑳</sup>。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穷理”与躬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



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细绎玩味。”<sup>②</sup>“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sup>③</sup>“延平四贤”培养出几代几大批名人。仅朱熹来说,其门人有案可查的著名者达 500 余人,散播于福建 29 个县。如建阳有刘燾、蔡元定、蔡渊、蔡沆、蔡沈、刘炳;崇安有欧阳光祖、张宗说;浦城有杨与立、杨道夫、杨骧、张彦清;顺昌有廖德明;同安有曾秘、许景阳、陈齐仲;晋江有傅伯寿;漳州有朱飞卿;龙溪有陈淳、黄学皋;莆田有方士繇、方壬、陈宓、黄士毅、郑可学;宁德有陈骏、龚郊、李鉴、郑师孟;古田有余偶、余范、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孙、林师鲁、林大春、程若中、程深父、蒋康国;霞浦有黄尚质、林湜;福鼎有杨楫、高松;福安有杨复、张泳;闽县有黄干、张洽;长汀有杨方;等等。“延平四贤”门人效法先师,著书讲学,培育后人。如闽县黄干晚年归里,日夜编礼著书,讲论义理,“弟子日盛,借邻寺以处之,质疑请益如熹时。”<sup>④</sup>龙溪陈淳,“漳泉人士争师之,淳讲解率至夜分无倦色。”<sup>⑤</sup>在朱熹避“庆元党禁”时,闽东朱熹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还分别主持古田溪山书院、擢秀书院、兴贤书院等配合朱熹在古田蓝田书院的讲学,聚徒讲学,各地学士闻讯负篋来读。

在“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及其门人、其他理学家的启迪倡导下,福建文化大昌,读书风气浓厚。据方志记载:宋至清,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家乐教子,朝诵暮习,洋洋盈耳,称为邹鲁之邦。”<sup>⑥</sup>邵武“儒雅乐善,比屋弦诵,号小邹鲁”、“人尚理学,彬彬乎道德文物有邹鲁之遗风。”<sup>⑦</sup>《晋江县志》记载:“得朱紫阳(熹)簿同(安),往来过化,海滨邹鲁之风……由来久矣!”光泽原文化极为落后,自南宋以来,“衣冠文物,中州鲜与齿,盖由西山李先生得道南之绪,大倡斯道月洲、云崖,教育嗣布,与考亭师友济美当世……流风余韵,犹有存者所致然也。”<sup>⑧</sup>尤溪原是一蛮溪獠洞,“自大儒笃生以来,士颇知学,户有诵,家有弦,彬彬然风雅是尚。”<sup>⑨</sup>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重视教化,重视培养人才,使宋以来福建在文化领域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成就和突破。福建除了在哲学上产生了闽学及考亭学派外,在刻书、文学、史学、书法、科技等方面,也呈现繁荣景象。因闽学兴起,福建刻书业也极为兴盛,形成独具特色的建刻。孙敏修统计宋代有 14 家刻书,福建占 8 家,“麻沙、崇化两坊户书,号为图书之府”,福建建阳在宋、元、明三代,均始终是全国的刻书出版中心。朱熹等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书法家等。

在“延平四贤”及其门人勤耕不辍、教化培育下,宋代福建中进士者达 7600 余人,约占全国中举总数的 25%,所以《宋史·地理五》载曰:“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林尚仁在《端隐吟稿·陈必复序》里也说:“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福建为宋代全国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到清代,福建举人数达 1300 余人,约占 4.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之,“延平四贤”重视教化,有力地推动了闽地文教事业的繁荣昌盛。

## 四

“延平四贤”杨、罗、李、朱重视道德修养、立纪纲、励风俗、重气节,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社会风尚。

杨时一生尊师重道,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勇于弹劾权奸,忠诚正直,力主抗金。杨时从小就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年丧母,哀伤之情不减于成人。后奉事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杨时拜二程为师,尊师重道,提倡“践履”、“居敬”、“穷理”等一套修身求道的方法。元丰八年(1085 年)六月底,程颢逝世,杨时悲痛万分,



向各处学友发讣告,带领学生在徐州设灵堂,摆灵位,哭悼先师<sup>②</sup>。元祐九年(1093年)隆冬时节,杨时与游酢以师礼去洛阳拜见程颐,程颐坐在厅上瞑目瞌睡,他们便立于门外等候,时天下大雪,杨、游仍恭立雪中,待程颐觉醒,积雪已达尺余。程颐感动地说:“贤辈尚在此乎?”<sup>③</sup>杨时尊师重道、“程门立雪”精神代代相传。杨时任过地方官,也任过朝官,但一生为官清正,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颐在《问书册》中说:“视公一饭,虽疏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温袍若皆适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羨而求安也。”<sup>④</sup>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sup>⑤</sup>。他关心人民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他任济阳知县,值多灾,他先后上书有司反映灾情,为民请赈济。由于漕使胡师文妒视安抚使张舜民礼遇杨时,以“不催积欠”罪诬陷杨时,杨时被罢职但无憾。徽宗政和二年(1112),杨时在萧山知县任上,兴修水利,缓解当地积年之旱涝,使民得灌溉之利。离任后,“邑人重其名,多画像事之。”<sup>⑥</sup>对权奸,杨时勇于挺身弹劾。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狼狈为奸,“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sup>⑦</sup>徽宗大观六年(1107年)杨时任余杭知县,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sup>⑧</sup>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又不顾个人安危,上疏乞诛童贯。当陈东率太学生与京城百姓十余万人伏阙上书,要求诛蔡京等“六贼”,乞留李纲,对金抵抗,而“朝廷忧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sup>⑨</sup>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见,杨时气节高尚,忠心耿耿,无愧为贤者。

罗从彦一生清节自守。他除在61岁时,做过短期惠州博罗主簿外,一生绝意仕进,“严毅清苦,簞瓢隐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sup>⑩</sup>他有二首诗表明心志:其一《勉李愿中》“权门来往绝行踪,



一片闲云过九峰。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疏慵。”其二《颜乐亭》:“山染岚光带日黄,萧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与真堪笑,赖有颜瓢一味长。”由于他清节自守,就是在博罗主簿任上,他也是宦囊如洗。他逝世后,“丧不能还”,其灵柩为一族人帮助护送返闽,后由门人李侗替他安葬的。罗从彦虽是一名寒士,但却从未忘记国家的安危,“卒稔裔夷之祸,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sup>⑦</sup>并针对当时社会弊病,强调托古改制,“明道以行忠义”。“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董仲舒、唐韩愈、柳宗元夸尚古文,二者渐失周孔之心,于是明道者寡,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sup>⑧</sup>罗从彦还采摘先朝故事,以论治国,编成《遵尧录》一书,提倡节俭、反对侈糜,要求朝廷“悯生民之重困,发德音,下明诏,铲除弊法”,“以望太平矣”<sup>⑨</sup>。在修身治国上,罗从彦主张朝廷要振纪纲,用人要得当,士子应正直忠厚。“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乱。”“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摧。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必有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又如:“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入于懦。”<sup>⑩</sup>对于“一国之君主”,罗从彦以为要“明而不察,仁而不懦”,主张人君要善于纳谏:“纳谏之本在于先虚己”。这些都体现了罗从彦的忧国之心、爱国之心,并重视道德修养。罗从彦对师长也极为尊敬。他曾五次受学于杨门,讲学论道,相得益彰。绍圣丁丑(1097年),他得悉伊川先生被贬而特往慰问;伊川先生因被诬贬,郁愤而亡,其门人未敢吊丧,罗从彦则在赴京途中转道洛阳,往伊



川县白虎山下谒扫先生墓,以尽弟子之谊,为世人所称道;元符庚辰年(1100年)龟山先生被诬,罢官回乡讲学含云寺,罗从彦多次执弟子礼前往就学,且志益坚,其学亦益醇,尊师之情亦益弥。

李侗从学罗从彦,一心继“圣人绝学”不求功名利禄。从学数年后,即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结庐山中,过着十分清苦简朴的生活。他尽管清贫,但却乐于助人,表现出高尚情操。“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然。”<sup>⑩</sup>李侗虽不求功名利禄,终身不仕,但他时刻关心国家命运,“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sup>⑪</sup>隆兴元年(1162年)朱熹应诏入朝奏事,行前将封事稿本送给李侗批改,李侗阅后复信说:“今日国家所以不成事功者,正挫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国是可尔。”并嘱咐朱熹“吾侪虽在草野,忧世之志但无所伸,亦可早发为佳。”<sup>⑫</sup>李侗一心“继圣人绝学”,因此师事罗从彦,“尽得其所传之奥”。罗从彦称赞李侗:“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趋向大抵近正。”<sup>⑬</sup>同窗学友沙县邓迪也赞美李侗:“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非吾曹所及。”<sup>⑭</sup>李侗成为开紫阳之道脉,传先圣之正绪的导师。李侗是贤者不为过。

朱熹被称为“贤者”,更为后世所公认。他在南宋,历高、孝、光、宁四朝,累官枢密院编修、转运副使、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朱熹一生主张对内修政事,爱养民力,澄清吏治,勤俭治国。诸如为山谷细民请赈济和抑压豪强高利贷盘剥;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纠正有业无税和无业有税不合理现象;要求皇帝“正心术”、“存天理灭人欲”,廉政肃贪,治国兴国。朱熹本身生活极俭朴,其门人黄干在《朱子行状》中说:“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敢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他在传道授徒时,与门人弟子共过艰苦生活:“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sup>⑮</sup>。接待客人,他从不铺张,据记载,有一次“胡纁谒



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至，先生遇礼不殊。胡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朱熹希望整肃纲常风纪，制订了许多礼教。对外，朱熹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和议，主张攘夷狄。孝宗即位之初，朱熹上封事时，就大声疾呼：“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明矣……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仇讨贼，自强为善之说，见于经传者，不啻详矣。”<sup>④</sup>朱熹尊师重道，对老师李侗极敬重，“自李先生后，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sup>⑤</sup>锐意进取，终创闽学。在传道中，在待人处世上，在为官从政中，朱熹强调“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地位贵贱，都应当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延平四贤”重道德修养、立纪纲励风俗、爱民爱国的道德操守，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文明程度，促进了福建民智的开发和社会风尚的提高。宋元以来，福建许多地方士子尊师重道、敬业守职、知书达礼，百姓勤俭乐善、崇礼守法、见义勇为、爱国爱民，美德世代相传，蔚然成风，名人辈出。下面举几例予以说明：

“南平风俗……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年湮代远，而入其邑乘，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俗，犹有存者。”<sup>⑥</sup>

“建阳风俗淳朴……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宗族比闾之间，患难相维持，缓急相倚赖，穆然有古朴之风。”<sup>⑦</sup>

“古田旧为山洞……民顽俗犷，夙称难治……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啬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存醇朴之风”<sup>⑧</sup>。“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羲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sup>⑨</sup>。



浦城人真德秀为官刚正不阿,以敢言著称,在朝不满十年,奏疏达几十万言。他在奏章中指出:“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言,用人不以才胜德。”他强调:“国之将亡不在敌国外,而在民心”。他力主垦土养财,修明政治,整饬武备以自强,时时防患于未然。建瓯人魏行可,建炎间奉使“见金人于澶渊,因留不遣,语其属曰:‘人孰无死,为国死犹生也’,金人逼以仕不从,乃饮鸩死。”<sup>①</sup>建瓯朱子后裔朱浚,元兵下建宁时,当时福州守王刚中投降,“朱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并饮药死。”<sup>②</sup>建瓯人谢璧在宋理宗景定年间,时奸雄贾似道专权,众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谢璧挺身而出,屡屡和贾似道进行论争,挫击了邪恶势力的气焰。元兵南下,沿途守镇纷纷瓦解,赋闲家中的谢璧尽管已是顽疾在身,但仍奋力募集起一支由1700人组成的义勇军,浩浩荡荡北上抗元。朱熹三传弟子文天祥,德祐年间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后文天祥兵败被俘,慷慨就义。其崇高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照日月,浩气长存。

闽学即朱子理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存在有消极因素、封建性糟粕。如封建的三纲五常,《家礼》中繁多的礼节规定、父家长制的专横规定、对妇女的种种限制,等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压抑了正常的人性。但是,“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对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他们那种结合社会实际传道东南、创立闽学的精神,对前人的儒学思想及佛道思想的批判性整理总结、采纳吸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尊师重道、敬业守职、坚持不懈发展文化教育的精神,积极入世、忧民爱国、崇尚气节的精神,重道德操守、崇礼守法、勤俭乐善的品德,等等,在今天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反对拜金



主义,加强廉政自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 【注释】

- 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②《礼俗志》,《建瓯县志》卷 19,民国版。
- ③祝穆:《方輿胜览》。
- ④宋孙复:《辱儒》,《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 ⑤引自《南平县志》卷 13,民国版。
- ⑥《宋元学案》。
- ⑦张岱年:《福建朱子学·序言》。
- ⑧《重修豫章先生罗源祠记》,《南平县志》卷 13,民国版。
- ⑨《道南祠记》,《南平县志》卷 13,民国版。
- ⑩《重建朱文公祠记》,《南平县志》卷 14,民国版。
- ⑪《八闽理学源流》。
- ⑫金云铭:《朱子著述考》,《福建文化》2 卷 16 期。
- ⑬吴锡璜:《循吏·主簿》,《同安县志》卷 35,民国版。
- ⑭《杨龟山集·语录》。
- ⑮《豫章文集》卷 17《诗文·勉李愿中》。
- ⑯《朱子语类》卷 104。
- ⑰《黄勉斋集·朱子行状》。
- ⑱《朱子语类》卷 11。
- ⑲《朱子语类》卷 10。
- ⑳《朱子语类》卷 10。
- ㉑《朱子语类》卷 11。
- ㉒《朱子语类》卷 13。
- ㉓《黄勉斋集·本传》。
- ㉔《陈淳传》,《福建通志》卷 40。
- ㉕《风俗》,《延平府志》卷 1,嘉靖版。



- ②⑥《风俗》，《郡武府志》卷 2，嘉靖版。
- ②⑦《光泽县志》卷首，明正统版。
- ②⑧《尤溪县志·风俗志》，民国版。
- ②⑨《宋史本传》。
- ③⑩《将乐文史资料》第三辑。
- ③⑪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
- ③⑫《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 ③⑬《宋史·杨时本传》。
- ③⑭《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 ③⑮《宋史·杨时本传》。
- ③⑯《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 ③⑰《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 ③⑱《李侗传》，《南平县志》卷 20，民国版。
- ③⑲《遵尧录序》，《南平县志》卷 16，民国版。
- ④⑩《罗豫章集·议论要语》。
- ④⑪《宋史·李侗传》。
- ④⑫罗从彦：《与陈默堂书》
- ④⑬《宋史·李侗传》。
- ④⑭《宋史·朱熹传》。
- ④⑮《朱文公文集》卷 11《壬午封事》。
- ④⑯明周木：《延平答问序》。
- ④⑰《重修南平县志序》，民国版。
- ④⑱《建阳县志·风俗》，道光版。
- ④⑲《古田县志·风俗》，乾隆版。
- ⑤⑩《古田县志·序》，乾隆版。
- ⑤⑪《建甌县志》卷 31，民国版。
- ⑤⑫《建甌县志》卷 31，民国版。



## 略论朱熹与福建文化

张品端      张茜

朱熹是近古文化巨人。钱穆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留下莫大影响”。“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sup>①</sup>这一评价确不为过。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生卒与居住于福建，著述讲学于福建，在福建创立闽学，形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朱子学派（亦称考亭学派），使得福建文化有彻底改观的契机。就其学术水平而言，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高峰，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从中国经学史看，在有典型性的汉、宋两朝经学中，郑玄集汉代经学之大成，朱熹则集宋代经学之大成。从中国著述史看，朱熹撰写或注释了 70 多部书，有 460 多卷。在中国教育史上，朱熹创办了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在中国文庙（孔庙）史上，被封建王朝列入“十哲”之内者，汉以后独朱熹一人。可见，朱熹及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起过突出作用。

福建古代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闽越文化阶段（从“七闽”到汉武帝灭闽越国）；二是中原文化入闽传播阶段（从汉至唐末、五代）；三是闽学文化为主流阶段